

# 「我們從自己的失去出發，伸出雙手擁抱我們傷害的人」：女性受刑人與凱西·布丹（Kathy Boudin）的人生故事

文 | 郭怡慧（Michelle Kuo） | 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客座副教授

譯 | 林紋沛 |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士、歷史學系碩士，專職譯者

在上一輩的記憶裡，凱西·布丹（Kathy Boudin）銀鐐入獄的經過無人不知，故事精彩刺激，煽動性十足。1981年10月，革命組織「黑人解放軍（Black Liberation Army）」在紐約近

郊搶劫一輛裝甲車，持槍者射殺了兩名警察、一名警衛，搶走160萬美元。

布丹並未武裝，她是四名接應車手之一。那天稍早，她把14個月大的孩

子托給了保姆，孩子的父親也是其中一名車手。兩人是激進組織「地下氣象員（Weather Underground）」共產主義派系的成員，組織以反對越戰、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為號召。兩人之所以受邀加入行動，原因之一在於他們的白人身分：白人司機被警察攔下盤查的可能性較小。布丹被以謀殺定罪，判處無期徒刑。

布丹的顯赫家世讓這起犯罪更添話題。布丹的父親雷納德（Leonard）當年是知名民權律師，過去的辯護對象包括被指控為共產黨的人，也擔任過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丹尼爾·埃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斯波克博士（Dr. Spock）等名人的律師；伯祖父則是傑出的社會主義組織者及耶魯大學法學教授。一位舊識告訴記者伊麗莎白·寇伯特（Elizabeth Kolbert），布丹家有種高知識分子的「嚇人」氣息（Kolbert, 2001）。家裡鼓勵布丹和哥哥勇於發聲，有所作為。哥哥後來從哈佛大學及哈佛法學院畢業，之後成為聯邦法官。借一句寇伯特的話，布丹家「可以說是抱負遠大、才華洋溢、自由開明的典型紐約猶太家庭，只不過他們的抱負、才華、自由都有點誇張過頭了」（Kolbert, 2001）。

布丹的故事在媒體上勾起各種情緒，從嘲弄、輕蔑、仇視到玩味、崇拜都有：出身優渥的女孩竟成了國

內恐怖分子。布丹就像伯納丁·多恩（Bernardine Dohrn）一類的人，都是「吃麥片長大的恐怖分子（granola terrorist）——備受寵愛的中產家庭孩子把自己想像成捍衛貧困弱勢的戰士」（Posnock, 2018, p. 5）。

但是布丹自己曲折的人生旅程獨一無二，反映她身處的動盪時代。布丹小時候夢想當醫生，長大進了布林莫爾學院（Bryn Mawr College）之後卻因為理科課程而打退堂鼓。畢業後，她為經濟研究與行動計畫（Economic Research and Action Project）工作，在克里夫蘭（Cleveland）一個工人階級黑人社區擔任社區組織者，代表貧困社區遊說政府提供垃圾清運等服務。經濟研究與行動計畫隸屬於民主社會學生聯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這是發源自密西根的激進學生運動，以反對越戰為宗旨。同時布丹也申請前往法學院深造，但是獲得錄取後卻將入學時間一延再延。日後在2001年，布丹告訴寇伯特：「我內心覺得越來越矛盾，很難想像自己成為專業人士，這似乎會讓我的人生繼續獲取更多特權」（Kolbert, 2001）。

布丹搬回紐約，住進格林威治村的一間公共住宅，和地下氣象員的組織成員一同生活。然而一枚炸彈在家中意外引爆，一切霎時變了調。布丹的三個

朋友因此喪命，爆炸時布丹正在洗澡，事發後她逃離現場。現場拍到一名裸體女性置身於瓦礫堆的照片，照片先在媒體上流傳，之後出現在 FBI 的傳單上，FBI 試圖找出布丹的下落。布丹後來銷聲匿跡 12 年：她用了幾百個化名，放棄個人財物，當清潔工糊口。如同寇伯特所說，布丹過著「為政治奉獻的苦行主義」生活（Kolbert, 2001）。某種程度上，這種孤立、退縮的卑微生活也讓她感到安心：她一直擔心自己會複製特權，如今終於避開了邁向特權之路。

因搶案被捕的時候，布丹剛剛開始改變生活。就在一年以前，她和父母恢復了聯絡，用回真名，也和大衛·吉爾伯特（David Gilbert）重修舊好，兩人後來生下一子。但是她並沒有拋下舊友，也沒有放棄黑人解放的信念。被捕前 24 小時，布丹和一名黑人解放軍的成員碰面。往後的日子裡，布丹始終堅持自己不知道有誰涉案，也不知道搶案的執行細節。她的使命是「讓自己為第三世界的一員效勞」（Kolbert, 2001）：

謹守分際是我支持這場鬥爭的方式：我無權知道任何事情，無權參與政治討論，因為這不是我的鬥爭。我當然無權做出任何批評。我知道的越少、願意放棄的自我越多，就越理想——這樣我就奉獻得越多，也越道德（Kolbert, 2001）。

布丹的故事或多或少啟發了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1997 年獲得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的小說《美國牧歌（*American Pastoral*）》，小說改編的電影《美國心風暴》由伊旺·麥奎格（Ewan McGregor）執導主演。故事敘說 16 歲的梅樂·黎沃夫（Merry Levov）加入類似地下氣象員的組織，她炸毀郵局，造成一人喪生。和布丹一樣，梅樂遁入了地下；和布丹一樣，梅樂出身已經融入社會、經濟安穩的猶太家庭；和布丹一樣，梅樂信奉的理念也認為放棄自身小我和政治暴力的信念密不可分。文學評論家洛斯·波斯納克（Ross Posnock）解釋：「把梅樂·黎沃夫和凱西·布丹放在一起比較，就能清楚看到羅斯掌握了女性恐怖分子特有的心理困境——梅樂演出了凱西·布丹即將經歷的人生：暴力表達意志後退縮回極端的女性被動狀態」（Posnock, 2018, p. 5）。波斯納克指出，梅樂是父親的扭曲鏡像：梅樂的父親接受了美國的幸福觀——同化、舒適生活、徹底脫離根源，梅樂則聽從組織的激進要求。兩人「都無法表達自我想法，只懂得服從不容置疑的理想」（Posnock, 2018, p. 5）。

## 1990 年代刑罰中的變革力量

但是一向痛恨人類的羅斯有個從沒想過的問題：梅樂（或是布丹）可以

彌補前非嗎？犯下暴行之後，梅樂怎麼樣可以活出有意義的人生？要怎麼把傷害的影響化為正面改變的契機？有沒有可能走出不同的路，過著積極主動、合乎道德的有為生活？

布丹被捕後的人生故事提供了一種答案。她在獄中打造出有意義、有建樹的生活。她強調人與人之間應該相互依賴，強調獄中女性應該保有尊嚴和慷慨。布丹實踐自己的行動主義（activism），領先時代一步，或者也可說是與時代緊密相連。「女性受刑人不只是被動的服刑者，也不只是社會問題而已。討論女性受刑人擁有哪些可能時，這點是非常關鍵的認識」（Boudin, 2007a, p. 20）。布丹堅持應該正確認識獄中女性：她們握有解決方案，能夠推動進展，能夠創造變革。

可以想見，一定會有人認為，為布丹想像這種後續發展實在超出了羅斯的感性範圍。羅斯的《美國牧歌》甚至懶得為梅樂編寫結局：梅樂直接淡出故事。最後一次登場時，梅樂依舊過著地下生活，她營養不良，自暴自棄，在髒亂的房間裡逐漸凋零。羅斯稱之為「美式暴戾（American berserk）」，這是無法打破的暴力與懲罰循環，不可能出現和解。我們無法拯救自己，只能困在一代又一代病態的反覆傷害裡。

但是我猜想，羅斯對彌補的可能性之所以興趣缺缺還有另一個原因：他的想法也反映了當時極度強調懲罰、以報復為中心的刑罰理念，這套刑罰理念始於尼克森政府時代，在1990年代達到高峰。這幾十年間的重大公共討論根本完全不會談到監獄的替代方案，不會談修復（restoration）的可能性、談受刑人的人性。民主黨的立場轉向中間路線，在犯罪問題上附和共和黨的議程。1988年麥可·杜凱吉斯（Michael Dukakis）競選總統失利讓民主黨大受打擊——選舉失利要歸咎於對手惡名昭彰的競選廣告，利用性侵犯霍頓（Willie Horton）的案件挑起種族主義，挑撥美國選民對犯罪的恐懼；於是民主黨爭著要比共和黨表現得對犯罪更強硬。柯林頓總統1994年簽署的法案導致不幸後果：法案取消受刑人的佩爾聯邦助學金（Pell grant），美國各地的監獄大學因而關閉。全美原本350個監獄大學課程只剩下八個繼續運作（Boudin, 2007a, p. 19）。1996年，羅斯小說出版的前一年，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讓支持死刑的團體重新沸騰，也凝聚了受害者權利運動的力量。同年國會通過了《反恐怖主義與有效死刑法（Antiterrorism and Effective Death Penalty Act）》，《反恐法》可能構成了州立監獄囚犯聲請提審（讓上訴法院審查拘提合法性）的最大阻礙。國會還通過一項移民法案，讓法院更容易將犯

下輕罪者驅逐出境。

這十年同時見證了全美各地「三振出局法（Three Strikes statutes）」的誕生。「三振法」十分嚴酷，法律規定犯過兩次罪的人，第三次犯罪將處以 25 年以上刑期至無期徒刑。有兩起案件一路上訴到最高法院。退伍軍人李安度·安德拉德（Leandro Andrade）從凱馬特超市（Kmart）偷了九卷兒童錄影帶，被判處兩次 25 年徒刑（行竊地點分別是兩間不同超市），相加成為 50 年的刑期。蓋瑞·尤因（Gary Ewing）偷了三支高爾夫球桿，遭判 25 年內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2003 年，最高法院裁定安德拉德和尤因的判決合憲，理由是「三振法」反映了人民的意志。

婦女權益為刑罰政策提供了部分的道德論述和法制化推力。1970 年代中期後的 20 年間，犯罪受害者、女性主義者和保守的「法律與秩序（law-and-order）」運動者結盟，共同對刑事司法體系造成巨大影響（Barker, 2007）。1970 年代，聯邦政府的執法支援署（Law Enforcement Assistance Administration）每年向各州政府提供總額約十億美元的資金，用於打擊家庭暴力和性侵犯罪。這筆資金有個「重要的附加條件」（Gottschalk, 2006, p. 145），為了將受害者服務整合進執法部門和檢方辦公室，資金的執行策略將

受害者權利與一個指標緊密相連：提高刑事訴訟量。不和執法部門合作的家暴庇護所及性侵危機中心有時會面臨資金刪減。婦女權益團體重現了「性侵恐慌」，想像富家白人女性淪為危險黑人性侵犯的受害者。關於 1980 年代受害者權利組織的調查顯示，運動者「絕大多數都是白人、中年、女性——這種人口組成根本無法代表犯罪被害者的整體樣貌」（Gottschalk, 2006, p. 90）。婦女權益運動的最大勝利可以說是 1994 年通過的《反婦女暴力法（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法案向執法機構撥下資金，規定家暴發生時至少必須逮捕一人。滋養於報復的語言，以受害者的道德權威為後盾，「受害者權利運動」開創了一種討論犯罪的全新情緒表達方式。史格里亞（Scalia）大法官主張「三振法」合憲時也援引了受害者權利運動。

另一方面，有些團體對於「受害者權利」的可能內涵提出不同看法（尤其是非裔美國人的女性主義團體），他們質疑純粹只包括逮捕和監禁的解決方案會如何衝擊黑人和移民家庭。他們要求應該提供資金補助心理健康治療、罪犯的更生復歸，以及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的雛型，包括受害者與罪犯的調解等等（Gottschalk, 2006）。他們指責婦女權益運動強化了既有制度的合法性，有色人種往往被

針對定罪；他們點名主流女性主義者在面對攸關黑人女性的議題時沉默不語。黑人女性入獄的可能性高達白人女性的八倍，主要原因是毒品相關犯罪（Guy-Sheftall, 2003, p. 178）。後來證明他們的批評言之有理：《反婦女暴力法》通過以後，警方處理家暴時也逮捕了女性，有些時候是出於自衛而動手的女性。今天這類主張被汎稱為「監禁女性主義（carceral feminism）」，但並非所有家暴受害者都希望伴侶入獄服刑；許多人希望伴侶可以更生復歸、投身工作，為家庭提供經濟和情感支持。

布丹在獄中見證了國家的懲罰心態和往往流於種族主義的邏輯。身為曾經參與激進解放運動的中產階級白人女性受刑人，布丹身處的位置十分獨特，她注意到黑人女性和移民女性在公共論述裡幾乎完全缺席。最讓她震驚的是犯下暴力罪行的女性完全隱身消失。她看著朋友的假釋申請被委員會拒絕，年復一年重回牢籠之中。布丹寫道，這對年輕女性的打擊格外沉重：她們尊敬年長女性，看到年長女性已經完全改過自新，推動計畫、經營親職團體、分享智慧之見、經營圖書館，但卻依然被凍結在幾年前（甚至幾十年前）犯下的罪行裡。

最早刺激布丹採取行動的是 1980 年代後期的愛滋危機。1987 年，有將

近 20% 進入矯正體系的女性驗出 HIV 陽性。愛滋病是年紀 25 歲到 44 歲之間的黑人女性的頭號死因，每 160 名黑人女性就有一人被感染，她們死於愛滋的可能性是白人女性的十倍（Guy-Sheftall, 2003, p. 178）。監獄裡週週都有女性死去，但是因為愛滋病嚴重受到汙名化，大家對此絕口不提，整個機構籠罩在強烈的恐懼之中。有些人曾是或仍是用藥者，她們害怕自己遭到感染；有些人是感染者的家人。監獄裡有 800 名女性，但醫療服務卻僅限於醫護人員的簡短出診。

布丹的行動主義始於看似簡單的計畫：拼被縫製。布丹和其他人一起縫被子，紀念死於愛滋的女性。她們把拼被展示在獄中各處，放在幾百名女性舉目可及之處。純粹的紀念之舉就展現出強大力量。布丹寫道：「愛滋不再需要隱藏、忌諱，愛滋突然成了大家可以談論的話題」（Boudin, 2007a, p. 17）。拼被縫製又讓大家能夠要求更多資源：愛滋防治教育，如何告訴親朋好友正確的愛滋病毒知識。

身在監獄必須謹慎行事。組織運動到哪裡都不容易，但是在監獄還有個額外限制：不能使用「組織」一詞（Kolbert, 2001）。受刑人可以請求許可、可以建立計畫、可以要求「便利化」，這些是獄政官員可以接受的用

詞，他們討厭權威被貶低、被挑戰。布丹說明，教育在官員眼中始終是根芒刺，因為受過教育的人要求也會更多。愛滋教育更是棘手，因為談愛滋「就要談到性和毒品，兩者都是監獄不允許的東西，矯正人員不想承認性和毒品會出現在監獄裡」（Boudin, 2007a, p. 17）。監獄最後終於同意受刑人的要求，讓愛滋教育工作者走入監獄，這是一大勝利。「我們希望在監獄裡創造社群，我們希望照顧眼前垂死的姐妹，防止更多人生病。是我們女性受刑人推動了這個發展」（Boudin, 2007a, p. 17）。

### 「我們從自己的失去出發」： 媽媽受刑人與修補關係之舉

對媽媽受刑人來說，跟孩子分離是入獄最難熬的地方。「第一個打擊我的現實是，我把 14 個月大的孩子留在了保姆那裡，」布丹寫道。「我撕裂了最根本的人際連結，背叛了母親照護嬰兒的職責……在分離兩個月後的初次會面裡，兒子似乎不認得我了——他認不得母親，用母乳哺餵了他一年的母親」（Boudin, 2013, p. 1）。

但孩子的存在也為改變帶來了希望和動力，布丹正是一例。被捕後不久，布丹的母親告訴她，為了兒子必須堅強，這句話她一直謹記在心。頭幾個

月裡，布丹專心研究怎麼為兒子盡一分心力：她選了新的養父母，鉤織填充動物玩偶。經過兩個月，兒子終於又認得她了。布丹寫道：「我一度背叛了這個生命的信任，但是在跌跌撞撞努力照顧他的同時，我自己的人性也獲得滋潤，這是修補我破壞的人際連結的第一步」（Boudin, 2013, p. 1）。

布丹試著營造空間，讓媽媽受刑人可以談論自己為修補關係付出的努力。社會的汙名化構成一大障礙，讓她們感到羞恥無助。她們是「丟下孩子的壞媽媽」、「嗑藥媽媽、毒蟲媽媽」。如同布丹的共同作者羅斯林·史密斯（Roslyn Smith）所言：「身為受刑人，我們老被罵成地球上的敗類。別人就是那樣看我這個人？那我就會變成那種樣子」（Boudin & Smith, 2003, p. 256）。暴力、毒品和受虐的童年往往是她們人生故事的一環。「孩子需要我的時候，我在哪裡？」布丹團體裡的一個成員說。「我在和男人鬼混，工作，吸毒。吸毒成了我的全部。就算聽到孩子大喊『媽媽』，我也麻木無感」（Boudin & Smith, 2003, p. 256）。布丹引用了另一位成員塔瑞瑪（Tareema），塔瑞瑪回憶道：

小時候我老是莫名其妙挨揍，媽媽把我的手都打斷了。我活在父母的暴力陰霾下，從六歲到十三歲半長年被父親性侵

(Boudin & Smith, 2003, p. 248)。

團體裡有個成員叫艾莉絲 (Iris)，她很害羞，經過好幾週才終於開口分享：

我懷孕的時候真是一團糟——一頓好打、黑眼圈、冰敷。我從他的表情就看得出來他又要發飆了，知道自己又要挨揍的時候，我就把孩子送進房間。我爸媽一直說「不要離開老公」。在局外人看來永遠是女人不對 (Boudin & Smith, 2003, p. 248)。

參加親職團體讓女性找到了談論自身失去感和羞恥感的方法，自身的失去感又讓她們更能反思自己對犯罪被害者的影響。「我們從自己的失去出發，伸出雙手擁抱我們傷害的人，」布丹寫道。「我體認到，堅守我們共同的人性，可以阻止大家殘忍傷害彼此」 (Boudin, 2013, p. 2)。而承認失去造成的痛苦，能讓她同理自己傷害過的人：

我們在親職教育課上痛苦自問：「我怎麼可以拋下孩子？我要怎麼回答講師的問題？我怎麼有辦法從獄中養育孩子？」我們兒童中心的創辦人伊蓮 (Elaine) 修女相信，人即使鑄成大錯，也能從中汲取教訓，為孩子的生活帶來改變。有位獄友為無法陪伴孩

子成長而悲傷不已，之後她看了一段親職影片，談毒品如何毀掉青少年的生活，她失聲驚呼：「天哪，原來我賣的毒品可能會這樣傷害別的孩子」 (Boudin, 2013, p. 2)。

認識自己的失去感也幫助布丹體會被這起犯罪波及的受害者有多悲痛。1981年搶案中遇害的三名男子身後共留下九個孩子。布丹出獄前發表了一篇短文，希望面對受害者及其悲痛：「我想瞭解〔他們的〕痛苦，想面對〔他們的〕怒氣，說『我非常抱歉』，這是我們唯一能請求寬恕的說詞。」布丹想親口向受害者道歉，只是礙於重要規定，犯罪者絕對不能和受害者接觸。不過在愛滋危機的因緣巧合下，布丹遇到了被這宗犯罪波及的人，一位80歲婦人的女兒。

她告訴我那天的可怕經過：一把槍抵著她的頭，車上80歲的母親被推出車外，車子被搶走徵用了。她作證指控我和所有被捕的人，為檢方擔任證人長達三年，對於協助逮捕所有人入獄感到自豪。她問我問題，一年又一年來探視我。她讓我知道罪行的後續影響，讓我有機會道歉。看到我人性的一面之後，她原諒了我。她幫助我體會到自己的人性。我還有許多受害者必須面對，他們的生活因無可挽回的損失和死亡而毀於一旦 (Boudin, 2013, p. 2)。



布丹強調，個人生命中的失去可以啟發我們同理自己傷害過的人，這個想法呼應了修復式正義的理念。儘管在布丹的時代還不普遍，但丹妮爾·塞雷德（Danielle Sered）、蘇嘉達·巴利加（Sujatha Baliga）和瑪麗亞梅·卡巴（Mariame Kaba）等行動者的努力已把這種概念推向主流（Kuo, 2020）。塞雷德說明，修復式正義讓受害者有機會直接面對傷害他們的人，告訴對方自己受到了什麼傷害。另一方面，犯罪者則有機會「面對生命被自己改變的人，成為必須對他人痛苦負責的完整的人」（Serred, 2019, p. 103）。塞雷德強調，修復式正義不需要受害者寬仁大度（mercy），只有寬仁「無法……構成正義」（Serred, 2019, p. 95）<sup>1</sup>。強調寬仁不只縮小了被害者的痛苦，也往往無法想像犯罪者自身的強烈情感和經歷：羞恥、受傷、冷漠、否認、拒絕改變，有時會渴望證明自己能夠改變。塞雷德解釋，在傳統的懲罰裡，人是因為犯行而受罰；修復式正義認為人「不只要對犯行負責，還要對受牽連的人負責」（Serred, 2019, p. 114）。

儘管如此，1981年搶案的最直接

受害者仍不可能與布丹和解。被害者家屬多年來串連反對布丹的假釋申請。2001年他們的抗議奏效，布丹的假釋申請遭拒；2003年布丹再次申請，這次成功獲得假釋。授予假釋的決定引起輿論譁然，假釋委員會的兩名委員不得不辭職下臺。其中一位遇害員警的遺孀黛安·奧格雷迪（Diane O'Grady）表示：「布丹能在獄中撫養兒子，她的兒子有人疼愛，但我們的孩子呢？我們每個人都認為只有死刑才能彰顯正義」（Kolbert, 2001）。與此同時，布丹假釋出獄後致力於提倡修復式正義，推動計畫讓獄中的少年犯和被害者面對面交流。

### 「親密悖論」

布丹22年來一直在思考和書寫如何在獄中盡人母之職，出獄之後，她把注意力轉向生活在高牆彼端的孩子。她和兒子切薩（Chesa）團圓，不久後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為了博士論文的研究，布丹參與「活力青少年（Dynamic Teen）」的活動，這個同儕團體集合了媽媽是受刑人的青少年；布丹訪談了其中八位青少年成員。媽媽

1 塞雷德經營的非營利組織「共同正義（Common Justice）」是全美第一個為暴力犯罪者提供修復式正義的計畫，作為監獄的替代方案。犯下暴力重罪的唐納爾（Donnell）參與了「共同正義」的計畫，他說：「我也必須體會自己的傷害，必須處理那個部分的自我」（Serred, 2019, p. 146）。唐納爾表示，面對被他傷害的人之後，他開始感到自己和被自己所傷的人有所「連結」（Serred, 2019, p. 146）。

受刑人協助設計了「活力青少年」的部分內容，不過歡迎新同儕加入和爭取外界支持的主力是青少年本身。

布丹著作裡最讓人動容之處是，布丹強調媽媽受刑人和青少年兒女擁有密切的關係。媽媽找到從遠方表達愛意的方式，孩子學會了接受與回應，布丹稱之為「親密悖論」（Boudin, 2007b, p. 142）。布丹寫道，一般可能認為監獄會阻礙母子之間的親密感，但是她的研究指出事實恰恰相反。八名受訪者幾乎全都在青少年時期完全和母親分隔兩地，其中至少一人完全只透過探視來和母親互動。儘管如此，大家「全都和母親維繫了深刻又複雜的長久關係，充分瞭解母親的韌性和脆弱之處……夾雜對親密感和距離感的矛盾渴望」（Boudin, 2007b, p. 183）。

布丹解釋，分離會強化對連結的渴望，分隔兩地的親職教養需要親子雙方「積極刻意」投入（Boudin, 2007b, p. 186）。出於形而下和形而上兩方面的理由，媽媽受刑人「更可能靜靜傾聽，提供內斂的建議」（Boudin, 2007b, p. 272）。另一方面，孩子也珍惜和母親見面的機會。一位青少年分享：「每個月都有新鮮事可以聊，就好像是把一整個月的話題存起來，等見了面再一口氣說出來，然後媽媽會全部聽進去」（Boudin, 2007b, p. 192）。或者像另

一位青少年說的：「我覺得自己這種親子關係比大部分朋友都更理想。因為……你更懂得珍惜父母，你知道嘛，平常看不到他們……能和他們見面就好像特殊待遇一樣」（Boudin, 2007b, p. 192）。

「活力青少年」提供的同儕團體對青少年來說非常重要。和年齡相仿的同儕一起到監獄探視母親，讓母親身在牢獄一事顯得正常。小時候他們週六單獨去探視母親可能會很開心，但是一旦成為青少年，他們會希望被同儕接納，也不想錯過社交機會。和母親一對一會面可能會有點沉重、有點尷尬；但若身旁有同儕相伴，母親突然間「就能變成正常的母親，成為別人口中的『你媽』」（Boudin, 2007b, p. 244）。青少年將這個同儕團體形容成大家庭，他們可以和其他人聊媽媽的事，自己的媽媽也成了朋友的阿姨或智慧長輩，是提供關懷和支持的網絡。青少年把同儕的母親當成阿姨，一起玩遊戲、一起聊天、吃東西。他們看到母親費心費力為自己打造這個計畫，還看到母親「扮演母親以外的角色：成為藝術家、協調者、照顧者、他人的同儕」（Boudin, 2007b, p. 244）。

布丹觀察的「活力青少年」計畫會舉行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從慶生會到畢業典禮一應俱全，各位媽媽

「對青少年孩子投入的事物樣樣展現出濃厚興趣」。此外，「單純陪伴彼此的身體接觸」就能讓無聲勝有聲：媽媽和女兒編髮辮，幫對方按摩，這些動作能夠「落實親密感」（Boudin, 2007b, p. 272）。母親準備點著蠟燭的蛋糕為孩子慶生。一位青少年史恩（Sean）說：「有些人生日甚至沒人祝他們生日快樂，或是沒收到什麼實質的東西……相較之下你媽真的費心為你做了準備，想起來很窩心……她關心你、惦記你」（Boudin, 2007b, p. 255）。另一大精彩傳統是母親們舉辦的畢業儀式，她們稱為成就慶典，慶祝孩子從這個年級畢業。

青少年們也自己規劃了一部分計畫內容，像是設計可以引導對話的問卷。問卷風格直來直往，個人色彩濃厚，讓我們得以一窺青少年聊天的樣子。14歲的雷根（Reagan）這樣回答問題：

問：來到諾斯洛普（Northrup CF）覺得怎麼樣？

答：就像到了一個可以擁有媽媽的休閒去處。

問：你來這裡想做什麼？

答：和媽媽共度時光，我在家裡辦不到。

問：如果別的小孩跑來問你一大堆你媽

的事，你會有什麼感覺？你怎麼處理這種情況？你會建議其他孩子怎麼處理？

答：嗯，我的想法是這樣：關他們屁事。

問：如果朋友好奇你媽人在哪裡，你怎麼處理來自朋友的壓力？

答：我沒這個煩惱，我不和朋友談到媽媽。

問：自己年紀還輕，媽媽又正在服刑，你有什麼心情？

答：很多母女活動我都不能參加，很難專心在上面。

14歲的赫克托（Hector）這樣回答：

問：你最喜歡這裡的哪一點？

答：可以見到媽媽。

……

問：有什麼可以協助你應對媽媽不在家這件事？你會怎麼建議和你面臨同樣處境的孩子？

答：不要學我。說出你的感受。

問：自己年紀還輕，媽媽又正在服刑，你有什麼心情？

答：很痛苦，知道自己的媽媽不在家裡，別人卻開口閉口都在聊他們的媽媽，我很嫉妒（Boudin, 2007b, p. 320）。

因此在出獄後的歲月，布丹再次自我改造，成為社會正義和受刑人子女相關計畫的研究者。布丹寫道：「我投入研究是為了學習和探索；我認為自己傳承了研究者的傳統，希望研究能夠協助打造出更美好的世界，研究者同時審視了壓迫和可能性，站在社會責任的立場投入工作。」布丹書寫年輕人的故事和他們為改變生活做出的努力，希望藉此揭示社會監禁政策造成的衝擊。

## 新時代

我出生在布丹被捕那年。1997年《美國牧歌》以精裝本出版時，我窩在密西根西部爸媽家裡的沙發上讀著小說。故事給我的印象是，年輕的梅樂嬌生慣養、思緒煩亂，傾向於自我毀滅。大概六年之後，也就是2003年，想不到我竟然在羅德獎學金（Rhodes Scholarship）的決選面試上碰到了布丹的兒子切薩。切薩拿到了獎學金（我沒拿到），我後來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讀到布丹家的故事，那篇文章以略帶挑釁的口吻說切薩贏得了世界上最負盛名的獎學金。

切薩後來繼續推動母親的志業。他為受刑人的孩子發聲，成為舊金山的公設辯護人，之後又在美國「進步


派檢察官（progressive prosecutor）」運動的浪潮下當選了檢察官。運動的核心宗旨之一是不應把監獄視為貧窮和精神疾病等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法。切薩的辦公室設立了冤罪單位，為一個因謀殺案被監禁32年的無辜男人洗清了罪名。切薩禁止刑事調查使用犯罪被害者的DNA。

我讀了切薩母親2000年代的著作，驚訝於發現書中思想多麼領先時代。布丹犀利地探討近五年來才進入主流視野的議題：修復式正義，以及其中關於修補（repair）和擔負責任（accountability）的理念；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必須把暴力犯罪者看成擁有人性的人；兒童與媽媽受刑人分離的影響。布丹的前瞻視野和敏銳眼光正是得自她親身體會到美國刑罰的擴張進逼。這不表示我們不認為犯罪議題充滿爭議、往往引起緊張衝突。一場激起強烈對立的罷免運動把切薩描繪成縱容財產犯罪的軟弱執法者，選民投票罷免了切薩。儘管如此，之前讓切薩贏得支持的進步派理念不久前還只處於邊緣地位，這些想法能夠從邊緣進入主流就足以讓人保持樂觀。

至於臺灣呢？臺灣的歷史同樣是由一連串革命浪潮寫成。1960年代到1980年代蹲過黑牢的政治犯出獄

之後成為受人愛戴的意見領袖，這是臺灣民主化的一大里程碑。他們在獄中和布丹得到了相同的發現：儘管條件百般不利，但在監獄這個地方大家能夠感受到團結精神，齊心協力。坐牢的革命分子包括了必須在獄中養育孩子的女性自由鬥士；儘管如此，在社會大眾眼中，監獄仍然被嚴重汙名化，這方面臺灣還有很長的路要努力。布丹的書寫和人生故事為我們指點出一條前進之路。我們應該開啟更多公共對話，談犯罪的原因、受刑人的人性、修復和改變的可能，以及監禁對受刑人家庭的影響。我們應該展開社會行動，貫徹布丹堅信不疑的原則：面臨問題的人也是握有解決方法的人。

不論在哪個國家，談受刑人的問題最後一定會繞回犯罪問題。那麼布丹的案子呢？40年過後大家怎麼看這個案子？過去五年來，加州選民反對繼續嚴懲「重罪謀殺（felony murder）」，這是繼承自英國的普通法概念，接應車手正是依這種概念被控謀殺罪。至於更上一層的政治暴力問題，重溫羅斯的舊作，我依然欣賞



*Photo by Kathy Boudin*

*You may write me down in history  
With your bitter, twisted lies,  
You may tread me in the very dirt  
But still, like dust, I'll rise.*

...


*Just like moons and like suns,  
With the certainty of tides,  
Just like hopes springing high,  
Still I rise*

...

*I rise  
I rise  
I rise*

—Maya Angelou

*Celebrating the life  
of Kathy Boudin*



*May 19, 1943 –  
May 1, 2022*

他的文筆，卻驚覺他極為鄙視 1960 年代的激進青年。布丹他們之所以渴望「把戰爭帶回國內（bring the war home）」，是因為他們堅信寮國人的生命和美國人一樣平等；美國人的納稅錢竟然用來購買導致越南人民或死或殘的化學武器；美國的黑人有可能遭到警察濫捕濫殺。另一方面，阿爾及利亞的前例還歷歷在目，他們的經驗似乎在告訴大家，暴力抵抗能成功驅逐殖民占領者。我不贊同炸彈攻擊或傷害人命，但我確實同意當時年輕人從上一代接過來的世界正在脫軌燃燒，暴力四處瀰漫。

2022年9月10日凱西·布丹追思會的卡片。親友齊聚一堂，回顧布丹的一生與貢獻。資料來源：陳昭如提供。



Music: *Sketches of Spain*—Miles Davis  
 Welcome by Emcee Yolanda Peterkin-Johnson  
 Speaker: Angela Davis  
 Speaker: Bernardine Dohrn  
 Poem: *Sometimes It's the Small Things*—Lorenzo Charles  
 Video of Kathy  
 Speaker: David Gilbert  
 Speaker: Cheryl Wilkins  
 Poem: *Sisterhood is Not Magic*—Laura Whitehorn

Speaker: Helena Kennedy  
 Song: *Amazing Grace*—Kayla Davion and James Olmstead  
 Speaker: Roslyn Smith  
 Video of Kathy  
 Poem: *The Skirt*—Ellen Sklar  
 Speaker: Nancy Gear  
 Poem: *The Call*—Unique Richardson  
 Closing Speaker: Chesa Boudin  
 Group Song: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Music: *Bach Brandenburg Concerto*

Forever in Our  
 Hearts

儘管如此，布丹服刑期間從未試圖為自己的過去開脫，承擔責任構成她自身尊嚴的重要核心。布丹寫道：「回顧自己的罪行，我知道自己絕對不會再涉入任何以社會變革為號召但可能傷害人命的行動。我已經不是22年前被捕的那個女人了，現在的我是和世界緊密連結的母親，如今孩子已經長大成人，一次又一次帶著我領悟

失去和愛的本質。悔恨會一輩子指引我。這是屬於個人的旅程，沿路會經過停步之處，但這條路沒有盡頭」（Boudin, 2013, p. 2）。

去年秋天布丹去世，享壽78歲，她的葬禮湧入了數百人。大家記憶中的布丹為人慷慨樂觀，目光遠大，總是積極幫助有需要的人。布丹兒

子的養母伯納丁·多恩提起她和布丹創造了獨一無二的共同養育策略。高中同學安琪拉·戴維斯（Angela Davis）說布丹很了不起的一點，就是能真誠陪伴她遇到的每一個人。大家反覆提到布丹的這個特質。切薩的悼詞為葬禮畫下句點：「好幾百人告訴我，他們從來沒有遇過有誰可以這麼認真傾聽、真心關懷。」他希望把這種精神「融入到人與人

每一次的互動」。

切薩細數布丹出獄之後母子一同經歷的冒險：去亞馬遜河划獨木舟、在北加州種花蔣草。但他也重溫了兒時回憶：小時候母親從獄中寄來念故事書或唱歌的錄音帶。成長期間，他把錄音帶拿出來一遍又一遍倒帶重聽。「我愛你（倒帶）、我愛你（倒帶）、我愛你。」

---

## 參考文獻

- Barker, Vanessa (2007). The Politics of Pain: A Political 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of Crime Victims' Moral Protests. *Law & Society Review*, 41(3), 619-664. <https://doi.org/10.1111/j.1540-5893.2007.00316.x>
- Boudin, Kathy (2007b). *“Children of Promise”*: Being a teen with a mother in prison and sharing the experience with peers [Doctoral dissertation,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https://www.proquest.com/pqdt/docview/304859688/403A3351121F4EEEPQ/1?accountid=14229>
- Boudin, Kathy (2013, April 10). *Kathy Boudin on Making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Patheos. <https://www.patheos.com/articles/making-different-kathy-boudin-04-11-2013>
- Boudin, Kathy (2007a). The resilience of the written off: Women in prison as women of change. *Women's Rights Law Reporter*, 29(15), 15-22.
- Boudin, Kathy, & Smith, Roslyn D. (2003). Alive behind the labels: Women in prison. In Robin Morgan (Ed.) *Sisterhood is forever: The women's anthology for a new millennium* (pp. 244-268).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 Center for Justic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2022, September 11). *Kathy Boudin Memorial* [Video].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nZfTNq70aI>
- Gottschalk, Marie (2006). *The prison and the gallows: The politics of mass incarceration 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791093>
- Guy-Sheftall, Beverly (2003). African-American women: The legacy of black feminism. In Robin Morgan (Ed.) *Sisterhood is forever: The women's anthology for a new millennium* (pp. 176-187).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 Kaba, Mariame (2021). *We do this 'til we free us: Abolitionist organizing and transforming justice*. Haymarket Books.
- Kolbert, Elizabeth (2001, July 8). *Kathy Boudin's dreams of revolution got her twenty years behind bars. Should she now go free?* The New Yorker.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1/07/16/kathy-boudin-profile-the-prisoner>
- Kuo, Michelle (2020, August 20). *What replaces prison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20/08/20/what-replaces-prisons/>
- Posnock, Ross (2018). Homegrown American terrorists: Merry Levov (of Roth's American Pastoral) & Kathy Boudin. In Ettore Finazzi-Agrò (Ed.) *Toward a linguistic and literary revision of cultural paradigms: Common and/or alien* (pp. 3-8).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Sered, Danielle (2019). *Until we reckon: Violence, mass incarceration, and a road to repair*. The New Press.